

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动机图谱及其影响

——价值共创视角下的混合研究

王学军 李航宇*

【摘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引领着社会治理创新。如何与公众有效互动，从而更好地实现公共价值，是政府决策部门高度关注的问题。论文基于以价值共创为新趋势的合作生产理论，围绕激励公众深度参与合作生产这一核心议题，采用混合研究方法，重新审视和解释公众合作生产行为，并挖掘行为背后的微观机理——合作生产动机。研究发现，为实现合作生产的公共价值最大化，既需要公众通过参与型合作生产行为回应政府期望，也依赖于公众表现出超越政策遵从的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利益权衡型动机、互动体验型动机和价值引领型动机是促使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关键动机归因，不同动机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会共同影响公众合作生产行为的尺度和水平。论文将建立在价值共创基础上的合作生产理论拓展到微观的行为公共管理领域，丰富了价值共创视角下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本土化研究，也为培育积极的公众主体提供了重要指引。

【关键词】合作生产 价值共创 个体动机 混合研究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486(2023)02-0004-21

一、引言

加快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我国社会治理的价值目标。倡导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顶层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指向公众参与的制度安排，如何激励公众

* 王学军，兰州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李航宇，兰州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的修改意见。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公共价值视角下的公共服务合作生产与绩效治理研究”（71974088），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十七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项目“公共价值视角下绩效考核影响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效应和路径研究”（171084），甘肃省优秀研究生“创新之星”项目“被动参与抑或创造价值：价值共创视角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微观叙事”（2022CXZX-033）。

参与共建共治共享，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及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是当前理论界和实践界关注的焦点。

合作生产理论为理解公众参与共建共治共享提供了潜在的理论解释。合作生产概念最早由 Ostrom 等学者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出，合作生产被描述为公共服务提供过程中公众参与的现象，强调公众在消费公共服务的同时也兼具生产性角色（Ostrom et al. , 1978；Parks et al. , 1981）。而后，合作生产概念得到了进一步发展。Bovaird（2007）认为，以公众参与为理论基础的合作生产简化了公共服务供需双方的复杂关系，合作生产应被视为一种超越公众参加（Participation）和参与（Engagement）的新研究范式。为发展出一个更加全面的合作生产概念，Osborne 等学者相继提出公共服务主导逻辑/公共服务逻辑等范式框架（Osborne et al. , 2015；Osborne, 2018），从理论变迁的角度重构形成了以价值共创为新趋势的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理论，用以描述“公共服务用户在服务设计、管理、提供和/或评价中自愿性或非自愿性参与”的过程（Osborne et al. , 2016）。

作为合作生产在后新公共管理时期的演变和发展，以价值共创为新趋势的合作生产理论为重新审视公共服务合作生产逻辑提供了新的视角，其重视以公众为中心的多元价值创造的理念内核，与“共建共治共享”的思想意涵高度契合。近年来，不少国内学者聚焦公共服务、社会治理、公共政策领域，整合合作生产、公共价值、价值共创等新兴理论思潮，尝试对合作生产理论进行本土化重构（王欢明，2022；王学军，2020a），相关研究呈现出从概念引介到实证分析的变化趋势。遗憾的是，现有研究主要在中观理论层面探讨合作生产问题，鲜有研究将价值共创视角下的合作生产研究拓展到微观的个体行为及其心理效应层面，尤其是较少有学者立足价值共创的分析视角，阐释和回应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激励问题。作为合作生产中价值主张的主要倡议者和促进者，政府既担负激励公众进入“共建共治共享”行动框架的责任，也面临确保公共价值作为合作生产根本方向的重要考验，基于价值共创视角审视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激励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受行为公共管理学的影响，在以激励公众参与合作生产为核心议题的前沿文献中，学者们开始将研究焦点从人口统计学因素转向更深层次的社会心理因素（李华芳，2020）。已有研究表明，公众的合作生产行为一般会以某种甚至多种动机为前提，合作生产动机被看作是理解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关键心理机制（Jakobsen & Morten, 2013），其可以预测不同激励措施下公众的合作生产意愿和行动逻辑。基于上述讨论，本文从以价值共创为新趋势的合作生产理论出发，以公共卫生应急事件中公众参与的合作生产现象为例^①，采用混合研究方法，重新审视和解释公众合作生产行为，梳理该

① 公众参与的范畴是指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境下公众配合政府进行居家办公、居家健康监测和居家隔离等活动，不包括其他情形。

行为背后的动机图谱。研究有利于夯实合作生产理论的微观基础，为有效激励公众参与共建共治共享提供理论启示。

二、文献回顾、问题提出和研究设计

（一）文献回顾

1. 合作生产概念变迁中的公众合作生产行为

严格意义上讲，公众合作生产行为并非明确的理论术语，而是寓于合作生产理论范畴中。早期的合作生产概念通常将公众参与视为公共服务提供的附加程序，公众必须在公共服务交付时及交付后以政府期望的方式行事，才能达成服务和政策目标（Brudney，1983）。公众参与合作生产被看作是政府实现服务绩效的一种手段，公众合作生产行为也因而表现为与资源贡献、政策遵从和服务互动等相关的参与活动（Alford，1998）。

然而，过分强调合作生产的工具理性和管理主义，易使事先难以准确界定的多元价值被忽视。为回应合作生产所面临的价值缺失问题，Osborne 等学者借鉴服务管理理论中的价值共创概念，重新定义并分析了合作生产理论框架，强调合作生产需要回应外部的、非时效性的以及长远的价值，揭示合作生产的本质是一种社会价值建构（王学军，2020b）。从这个意义上讲，合作生产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一种公众参与形式，而是公共服务生产的内在属性，与由公众驱动的价值共创直接相关（Osborne et al.，2016）。伴随着价值共创概念在合作生产研究中的广泛应用，一些研究也不满足于将此概念停留在理论框架的嵌套推演上，而是试图从价值共创角度审视公众合作生产行为。Tuan（2018）借鉴 Osborne 等学者提出的公共服务主导逻辑，参顾客价值共创行为量表，指出与公众合作生产行为直接相关的价值共创活动包括参与行为和公民行为两类。其中，参与行为是指合作生产中成功的价值共创所必需的和符合政府期望的（角色内）行为，涉及信息搜寻、信息分享、责任行为和人际互动。公众需要搜寻合作生产任务的信息，也需要在执行过程中共享信息资源、遵从政策规定、改善政民服务互动的关系质量。公民行为则是指公众自愿的（角色外）行为，涵盖反馈、倡议、帮助和宽容。尽管它并不是成功的价值共创所必需的个体行为条件，但可以为合作生产创造额外价值。公众通过表达公共服务的改良建议、倡导政府部门的良好形象、帮助他人满足公共服务需求以及容忍政府造成的附加服务成本等途径，为实现公共服务价值最大化采取行动。

2. 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动机图谱

早在合作生产概念诞生之初，就有学者尝试从动机角度探究公众为何参与

合作生产。早期研究虽未明确提出“利己”和“利他”的概念，但总体侧重于强调由金钱、福利等物质奖励引起的利己动机。这一时期的研究对动机图谱进行了初步探索（Sharp & Elaine, 1978），但遗憾的是，随着合作生产研究的式微，动机研究并未取得新的进展（Brudney, 2020）。21 世纪初，合作生产研究的复兴使其相关的动机研究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其中 Alford（2002）的研究最为经典，其摆脱早期研究秉持的公共经济学方法，遵循基于行为动机复杂性的研究路径，指出公众不只关注合作生产所带来的物质奖励，也重视非物质的、其他有价值的回报。Alford 的动机图谱沿用外在与内在、利己与利他的分析视角，区分了公众在合作生产中的价值期望，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动机类型学的基础框架。以此为起点，本文对动机图谱的研究进行梳理回顾。

在外在动机方面，基于收益 - 成本的纯粹考量，学者们明确将这类动机区分为获取合作收益的动机与避免制裁损失的动机。前者是指公众期望获得与其合作生产投入相称的利益补偿，例如代金券、社会福利、个体所需的整洁或安全的生活环境等（Verschuere et al., 2012），收益形式与公共服务结果（Outcome）的物质属性有关。而后者描述的是公众对不合作可能遭致制裁干预的回避，包括法律制度等强制措施和社会谴责等温和惩罚（Alford, 2002）。作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内在动机则涉及个体自主感、能力感和成就感等内部需求，源自个体期望从合作生产中获得自我决定感和能力（Alford, 2009），包括内在效能和外在效能两类（Van Eijk & Steen, 2016）。其中，内在效能是指公众对自己有效理解和有效参与的能力的看法，而外在效能是指公众对投入合作生产努力的有用性的看法，涉及公众对服务绩效的感知、对政府的信任和对参与机会的评价（Bovaird et al., 2016）。

当公众参与集体合作生产时，社会型动机通常也被学者们考虑为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重要动机，其具有外在动机和内在动机的双重特征。社会型动机的外部归因强调公众关注他人的看法和评价。例如，来自于社会成员的认可或压力会促使公众去遵守群体规范（Alford, 2009）。社会型动机的内部归因则和公众参与集体合作生产的享受和乐趣有关，源于集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为公众提供了必要的情感支持。也有研究表明，公众可以从集体行动中获得支持个体合作生产意愿和行为的集体效能感，具体表征为公众对通过集体努力所取得共同利益的信念、对社会成员合作生产意愿和能力的信任等方面（Fledderus & Honingh, 2016）。

无论是外在动机还是内在动机，在早期研究中，公众参与合作生产总是出于利己的目的。随着公共服务动机、亲社会行为等研究不断丰富，学者们开始重视个体超越自身利益的价值取向。有关志愿服务的文献指出，合作生产可能是基于“不纯粹”的利他主义（Impure Altruism），认为公众在参与时能够同时考虑自我和他人利益（Steen, 2006）。根据利他动机中目的取向的差异，可以

将其区分为规范型动机和表达型动机。前者是以遵守某种规范性价值承诺为行为目的，强调价值观对个体合作生产行为的影响（Alford，2002）；后者是以展示某种规范性价值为行为目的，认为合作生产任务能为公众带来实现自我价值的成就感和满足感（Sharp & Elaine，1978）。

（二）研究问题的提出

尽管以往研究在探究公众合作生产行为及其背后的动机图谱上已积累了丰硕成果，但对如何激励公众在合作生产中扮演价值创造者的动机阐释仍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面临着动机图谱的重构或再审视的需要。考虑到动机和行为之间的逻辑关联性，学者们对合作生产行为的理解决定着如何阐释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动机归因。随着合作生产研究从产品或服务主导逻辑转向公共服务逻辑，合作生产理论与价值共创实现深度融合，学者们开始摆脱早期合作生产研究中公众参与的解释框架，将公众合作生产行为的内涵寓于公共服务逻辑的研究范式之中，呈现出向价值共创延伸和拓展的理论发展趋势。在以价值共创为新趋势的合作生产理论下，政民关系的重构和整体性治理的要求促使公众承担更多的公共价值使命（Osborne et al.，2021）。公众作为合作生产者不只是表达需求、消费服务和评价服务，或是遵守公共政策调整以及约束合作生产的态度与行为，更重要的是以个体能动性整合有形和无形的资源，通过一系列价值共创活动增进不同维度的价值（Skålén et al.，2018）。但目前动机图谱的研究很少触及以价值共创为核心表现的公众合作生产行为，导致已有的动机结论难以充分阐释公众在合作生产中推进价值共创的行动逻辑。在公众合作生产行为研究中，虽然有学者关注到私人部门的价值共创行为研究对审视公众合作生产行为具有一定的理论适用性，但却忽视了公私部门合作生产具体情境的差异性。例如，在公共领域，合作生产的价值结果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包括私人价值与公共价值等多重维度（Osborne et al.，2016），单纯借鉴顾客价值共创行为量表难以刻画个体在改善公共价值方面的努力，在引入动机研究时需要结合具体情境对公众合作生产行为进行内容结构的调适。本文尝试从价值共创视角切入，在重新审视公众合作生产行为的基础上，更深入地探究激励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动机图谱及其机理问题。

（三）混合研究设计

为回应上述问题，本文采用顺序性探索的混合研究方法，即运用建构性思维分析开放性定性数据以构建理论模型，再通过定量研究对模型予以检验（谭新雨，2019）。为诠释实践中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动机和行为要素，本文立足于公众参与公共卫生应急情境开展混合研究设计。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现实表明，“所有好的做法如果想要奏效，必须要有公众的集体意愿”（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 2020)。公众通过采取主动居家、自觉测量体温、线上互助等行为, 为改善政府的公共卫生应急治理成效而贡献努力, 具有典型的合作生产和价值共创特征。本文的研究步骤是: 第1阶段, 运用扎根理论的编码技术明确公众合作生产行为及其背后的动机图谱, 形成理论范畴和模型框架; 第2阶段, 运用问卷调查的方式, 实证检验理论模型中动机影响合作生产行为的作用机理。

三、模型构建和质性分析过程

(一) 研究方法与数据选择

扎根理论的编码技术适用于从概念上发展出解释人类动机或行为模式的理论模型 (Woods et al., 2016)。沿着“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的程序化扎根思路, 本文首先对质性资料进行逐项提炼和归纳, 在厘清公众合作生产行为这一核心范畴的基础上, 识别个体行为背后的动机图谱; 其次, 探索各类概念范畴之间的逻辑关联, 围绕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动机与行为及其关系构建本文的理论模型。

依据“三角测量”的要求, 本文采用多种资料来源和搜集技术。本文的资料可以归纳为主资料和三角资料两类: 主资料是指以网民评论为代表的二手资料。以来自新浪微博的“近期你出门了吗? 每天都是怎么过的?” 在线调查作为本文的主要数据来源, 利用 Python 软件爬取 2020 年 1 月 29 日—8 月 27 日的全部评论, 通过对 1034 条评论预处理^①后, 剩余 482 条作为主资料。三角资料是指以访谈为主的一手资料。由于单条网民评论蕴含的相关信息较为有限, 本文通过半结构化的开放式访谈对主资料进行数据补充。在告知受访者相关背景知识后, 访谈围绕“根据您的经历, 请您回忆在参与公共卫生应急期间您做出过哪些努力或投入过哪些资源, 配合居委会、志愿者等共同维护本社区的公共卫生安全?”, 以及“请您回忆当时是出于什么想法或考虑去做出这些努力或投入这些资源?” 等核心问题, 对 10 名社区居民^②展开开放式问答, 要求受访者尽量在回答问题时列举具体事例。本文综合这些资料建立起研究资料库, 部分访谈资料应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

(二) 开放式编码及其范畴化

在开放式编码阶段, 本文将访谈语料和网民评论随机打乱, 以质性资料的

① 删除了与该话题无关或信息量稀少的评论; 删除仅涉及公众行为的评论; 删除评论中的话题标签。

② 由于公众参与公共卫生应急经历的相似性, 访谈在进行到第 10 名访谈对象时没有新的概念涌现。

每一条语句为分析单位,运用 Nvivo11 对其逐字逐句进行比较、编码、标签、登录,从中发掘初始概念,并进一步对获得的初始概念重新分类组合,实现概念的范畴化。如表 1 所示,共得到 48 个初始概念和 15 个范畴。

表 1 开放式编码与初始范畴提炼

范畴	初始概念
获取合作收益的动机	个体安全; 家庭安全; 风险感知; 风险规避; 充实自我; 陪伴家人
避免制裁损失的动机	群体规范; 对破坏秩序者的社会谴责; 管控感知
由归属需求引起的动机	亲朋好友的共同参与; 情感支持; 通过社交减少心理压力
由效能感知引起的动机	任务容易; 任务-能力匹配; 投入成本低; 集体努力的效能期望; 共同信任
由感恩心理引起的动机	对他人付出的感激; 对他人付出的珍惜; 与他人付出进行比较
为他人创造价值的动机	以他人安全为中心; 避免对他人安全产生负面影响; 维护他人安全的成就感
履行公民责任的动机	不给国家添乱; 为国家做出贡献
信息寻求	关注现实情况; 主动信息搜集
信息共享	准确表达个体需求; 向社区工作人员提供信息
积极遵从	减少外出活动; 个人防护; 保持良好卫生和健康习惯; 主动做好健康监测; 不信谣不传谣
良性互动	积极配合社区工作; 与社区工作者保持友好关系
意见反馈	向社区提供工作改进建议; 评价社区的管理方案
价值倡导	传递信心; 宣传政策; 转发有效信息; 劝告亲朋好友
助人为善	提供网络援助; 积极捐款; 健康知识科普; 提供解压策略
共同服务	参与社区志愿工作; 关注志愿者招募信息

注: 限于篇幅, 初始编码的语句没有包含在表中, 原始语句来源于访谈语料和网民评论。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三) 主轴编码与主范畴提炼

在主轴编码阶段, 为了确认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动机和行为要素, 本文将质性资料中涌现的 15 个副范畴进一步凝练, 归纳出动机和行为的 5 个主范畴, 并根据每个主范畴所体现的内涵, 借鉴文献回顾中系统梳理的动机和行为特征, 对每一个主范畴进行命名(见表 2)。

表 2 主轴编码与主范畴提炼

主范畴	副范畴	关系内涵
利益权衡型动机	获取合作收益的动机	具有利己取向、关注外部激励的合作生产动机
	避免制裁损失的动机	
互动体验型动机	由归属需求引起的动机	具有利己取向、关注内部激励的合作生产动机
	由效能感知引起的动机	
	由感恩心理引起的动机	

(续上表)

主范畴	副范畴	关系内涵
价值引领型动机	为他人创造价值的动机 履行公民责任的动机	具有不纯粹利他主义取向的合作生产动机
参与型合作生产行为	信息寻求；信息共享 积极遵从；良性互动	以参加、合规、遵从等为特征的一般合作生产行为
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	意见反馈；价值倡导 助人为善；共同服务	以实现公共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额外合作生产行为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选择性编码和模型建构

在选择性编码阶段，本文基于质性语料和对上一阶段形成的5个主范畴的统合分析，发现三类动机均可独立作用于参与型和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且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背后的动机要素通常以组合形式涌现，不同动机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各类概念范畴进行理论化。具体而言，利益权衡型动机、互动体验型动机和价值引领型动机可归纳为核心范畴“公众合作生产动机”，而参与型合作生产行为和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可归纳为核心范畴“公众合作生产行为”。综上，本文提炼价值共创视角下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动机行为模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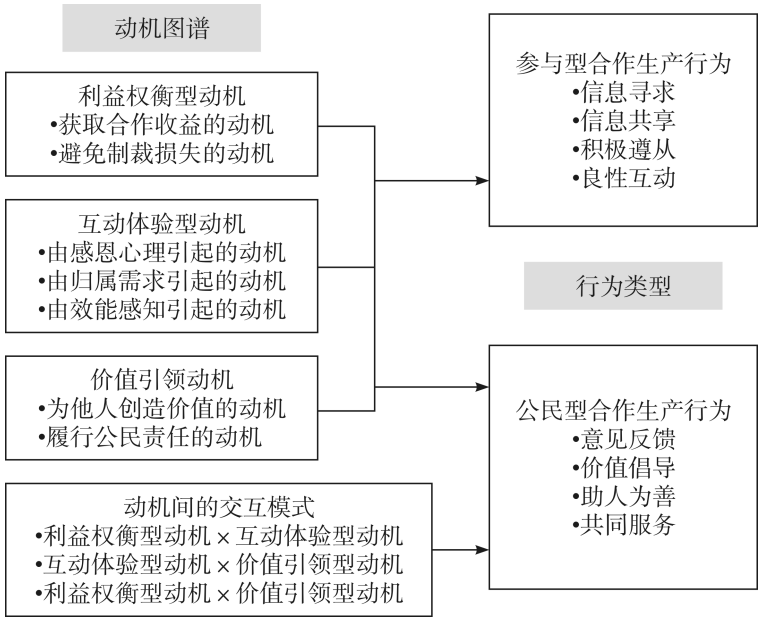


图1 价值共创视角下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动机与行为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五）理论饱和度检验

为了检验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动机行为模型的理论饱和度，本文选取部分访谈资料，重复进行前述的三级编码过程，并未发现新的概念与范畴，已有的范畴之间也并未出现新的关联，图 1 所示的理论模型通过了理论饱和度检验，具备较好的现实解释力。

四、编码结果阐释和模型质性分析

（一）公众合作生产行为类型及其内容的理论探讨

根据编码结果，与已有研究相似，公众合作生产行为可被区分为参与型合作生产行为和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两类，二者在任务特征和价值结果上存在学理层面的差异。首先，参考 Brandsen 和 Honingh（2016）对合作生产任务类型的考察，本文对参与型和公民型两类合作生产行为的任务特征进行区分，试图从“公众执行何种任务”的角度进行类型学分析。已有研究表明，依据公众所执行的合作生产任务接近组织核心服务的程度，合作生产任务可以按照“非互补性”和“互补性”加以审视（李华芳，2020）。前者依赖于公众的参与型合作生产行为，在本文的案例中表现为公众需要完成与公共卫生应急政策直接相关的合作生产任务；后者则与公众的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有关，公众运用自由裁量权和个体资源对合作生产任务进行主动调适和积极反馈，并在实现公共价值最大化方面做出建设性改变。其次，依据公共服务逻辑强调从关注绩效转变为创造价值的基本观点（Osborne，2018），本文将合作生产的价值基础作为界定公众合作生产行为类型的重要区分维度，试图从“公众创造何种价值”的角度进行类型学分析。受价值目标多元化的影响，参与型和公民型两类合作生产行为在其所要实现的价值结果方面相互区别。前者在本文的案例中表现为公众采取行动促进政府期望目标的实现；后者则旨在创造更多非任务型目标实现的额外价值，有效弥补了合作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价值缺失。

在类型区分的基础上，本文基于已有研究进一步细化并修正了公众合作生产行为的内容维度。例如，本文剔除了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中 Tuan 等学者（2018）所提到的宽容维度，原因在于宽容本质上具有被动接受的行为表征，公众仅需对服务交付的失灵问题保持耐心，而不必通过主动性行为付出额外努力。与之相比，共同服务维度更符合塑造公民性的价值共创情境的目标。其中，志愿服务是公众进行共同服务的典型方式。Parrado 等学者（2013）指出，志愿服务是合作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公众的公共价值合作生产息息相关。因此，有必要将具有志愿属性的共同服务纳入对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的考量。这些内

容维度与 Arnstein (1969) 提出的“公众参与阶梯”具有一定的理论联系和重叠,均揭示了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不同行动模式。但正如 Osborne 等学者 (2021) 注意到的,合作生产研究的公众参与路径缺乏对不同公众合作生产行为,以及它们对价值创造影响的整体性理解。因而,本文对两类合作生产行为的概念区分更关注合作生产行为与价值创造的关系,强调价值共创的实现需要两类行为共同发挥作用,而并不侧重于反映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程度。

(二) 公众合作生产动机图谱及其影响的理论分析

从动机角度来看,任何公众的合作生产行为都可以理解为主体基于利益权衡型动机、互动体验型动机和价值引领型动机影响所做出的权变选择。理论模型表明,不同动机的单独影响以及相互作用,影响着公众合作生产行为的尺度和水平。但究竟各个动机对公众合作生产行为是否产生显著性影响,影响方向和强度大小以及自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都需要量化研究方法予以考察和验证。本文对理论模型进行阐释和拓展(如图1所示),并提出系列有意义的变量关系和可供验证的研究假设。

1. 利益权衡型动机对公众合作生产行为的影响

利益权衡型动机本质上是一种外在动机。在合作生产动机研究领域,关于外在动机的认识已经较为丰富和成熟。已有研究发现,将提供外部奖励或惩罚作为影响公众自我利益的方式,可以激励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努力(Alford, 2002)。但也有学者认为,与外在动机相关的动机仅能够激励公众执行相对简单、频繁和简短的合作生产任务(Asquer et al., 2012)。本文在编码过程中发现,为保障个体及家庭的安全利益,受利益权衡型动机影响的公众也愿意承担复杂多样的合作生产任务。例如,有些受访者会深度参与到社区管理工作的监督过程,动用智力资源持续提供意见反馈,在改善私人价值的同时,也带来了社区公共价值的改进。而这些行为并不是政策干预的直接结果,具有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的特征。Pestoff (2012) 的研究也指出,当合作收益对公众具有持久且至关重要的影响时,公众倾向于做出更多合作生产行为。因而有:

假设1:利益权衡型动机正向影响公众的参与型合作生产行为。

假设2:利益权衡型动机正向影响公众的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

2. 互动体验型动机对公众合作生产行为的影响

合作生产本身会为公众带来丰富的参与体验(Osborne et al., 2016),贯穿于个体与任务、个体与其他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本文在编码过程中发现,这种内在感受表现为与社会心理相关的感恩、归属和效能感,并且对公众合作生产行为具有形塑效果。首先,感恩心理塑造了个体平等交换和互惠利他的内在动机,使个体能够超越狭隘的回馈或者模仿施惠者行为(McCullough et al.,

2001)。例如，在一线人员表率作用的影响下，公众除了遵从相关政策，还会主动做出参与志愿服务等合作生产行为。其次，公众在政策遵从期间无法像平常一样与他人建立社交联系，而合作生产可以为公众提供排遣负面情感、满足归属需求的途径，使公众更容易与社区工作者、其他居民产生良性互动，进而增强公众付出努力的意愿，建设性地做出符合共同利益的多样化合作生产行为（Letki & Steen, 2021）。最后，公众通过各类媒介获取健康知识和政策信息，有效提升了自身的合作生产能力。由于个体的效能期望具有延展性（周文霞、郭桂萍，2006），公众在胜任参与型合作生产行为的基础上，将自我效能感扩展到其他相近或不同的领域，从而表现出更多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因而有：

假设3：互动体验型动机正向影响公众的参与型合作生产行为。

假设4：互动体验型动机正向影响公众的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

3. 价值引领型动机对公众合作生产行为的影响

价值引领型动机强调公众的公共价值偏好，反映了公众的同情心、对社区事务的关心和对公共利益的关注等（Uzochukwu et al., 2018）。受价值引领型动机的影响，公众更容易产生利他的价值取向，愿意将自身视角移向其他社会成员，形成换位思考的心理机制（Hoever et al., 2012），做出更多慷慨付出的行为。同时，价值引领型动机也折射出公共精神、社区承诺、道德规范等不同形态的规范价值，在本文的情境中体现为强调国家安全、社会秩序、自律等公民责任。这些价值观念能够从行动主义层面将公众的参与性与义务性价值偏好相结合，激发公众在合作生产中的主动性。为维护自身所遵循的规范价值观和社会基本准则，公众更倾向于做出与之相符的合作生产行为，进而获取基于自我和谐感和自主感的心理收益（爱德华·伯克利、梅丽莎·伯克利，2020）。总体而言，价值引领型动机具有明显的亲社会倾向，驱动公众采取多种形式的合作生产行为增进公共价值。因而有：

假设5：价值引领型动机正向影响公众的参与型合作生产行为。

假设6：价值引领型动机正向影响公众的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

4. 不同动机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的影响

本文在编码过程中发现，相较于参与型合作生产行为，当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发生时，公众更有可能同时受到多种动机的激励作用。不同动机之间相互交融、彼此影响，折射出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背后动机交互的基本模式。

（1）利益权衡型动机和互动体验型动机之间的交互作用。Steen（2021）指出，由于外在和内在动机都能够在合作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必须了解两类动机存在何种拥挤效应，从而更加细致地解释公众合作生产行为。事实上，在动机研究领域中，外在动机和内在动机是受到广泛关注的经典性话题。相关研究表明，二者之间是一种共存的关系，存在不同的结论（张剑、郭德俊，

2003):一些研究发现,外在动机由对任务结果的关注所推动,造成个体忽视对任务内容的兴趣,从而削弱与内在动机有关的个体行为(Eisenberger & Cameron, 1996);而一些研究也指出,个体可以同时受这两种动机支配并感知到叠加递增效应,当基本的外在动机得到满足时,内在动机将进一步发挥作用,形成较高的满足感和创造力(Amabile, 1993)。如前所述,利益权衡型动机和互动体验型动机分别对应着公众的外在和内在动机,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的动机关系,可能会对具有较高的自由裁量权和创造性的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产生影响。因而有:

假设7:利益权衡型动机和互动体验型动机对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具有交互影响作用。

(2) 互动体验型动机和价值引领型动机之间的交互作用。价值引领型动机本身包含着个体的不纯粹利他主义取向。Van Eijk等学者(2016)指出,当个体基于利他动机为他人创造价值时,会以另一种方式从中受益,例如提升合作生产能力、建立社交联系等。这表明在价值引领型动机的驱动下,公众能够在合作生产中获取积极的内部奖励,从而增强公众的互动体验型动机,而互动体验型动机本质上是一种内在动机,影响个体的努力程度以及资源投入的持久力和耐力(Alford, 2009),能够为公众进一步采取行动持续提供充足的内驱力。因此,在两类动机的共同影响下,公众不仅可以基于公共价值视角深刻审视合作生产所要实现的价值结果(Carmeli et al., 2014),将合作生产视为个体造福社会的参与途径,也会在持续的投入贡献中,不断积累自我效能感、社会归属感等心理资本,从而持之以恒地保持积极的合作生产行为。因而有:

假设8:互动体验型动机和价值引领型动机对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具有交互影响作用。

(3) 利益权衡型动机和价值引领型动机之间的交互作用。有学者认为,利己动机和利他动机的关系并不总是对立的,个体能够通过利他的方式达到利己,也可以在利己的过程中实现利他(Alford, 2009)。在价值共创情境下,这种相互促进的动机协同关系尤为明显。当公众基于价值引领型动机在公共领域内促进价值的创造时,可以通过相互创造的公共价值对其损失的私人价值进行补偿(王学军, 2020b)。此时,公众不仅满足了利他的动机需求,也在为他人创造价值的过程中,保障了与利益权衡型动机有关的个体利益。吴结兵和钱倩严慧(2022)的研究指出,个体在满足健康等基本自利需求的基础上,更愿意做出具有利他倾向的合作生产行为。随着合作生产的深入推进,个体在追求社会目标等公共价值的同时,也在价值共创情境中实现了私人价值和公共价值的平衡。可以合理推测,在两类动机的共同影响下,公众能够更加持久地参与合作生产,表现出更多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因而有:

假设9:利益权衡型动机和价值引领型动机对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具有交互影响作用。

五、模型检验和量化分析结果

（一）研究方法和样本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检验理论模型涉及的研究假设。考虑到问卷发放的便利性和针对性，本文选取甘肃、黑龙江、广东等地，通过滚雪球抽样和现场填答问卷的判断抽样获取数据。本文剔除了无效问卷，最终从317份问卷中得到有效问卷309份。鉴于调查样本并非来源于随机抽样，该数据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整体而言，样本分布较为合理，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见表3）。

表3 问卷调查对象基本信息

变量	统计项	数量(人)	比例(%)	变量	统计项	数量(人)	比例(%)
性别	男	170	55.02	年龄	25岁及以下	72	23.3
	女	139	44.98		26-35岁	145	46.9
收入	3000元及以下	41	13.27		36-45岁	54	17.5
	3001~6000元	84	27.18		46-55岁	31	10.00
	6001~10000元	95	30.74		55岁以上	7	2.3
	10001~15000元	50	16.18	学历	大专以下	56	18.12
	15001~20000元	23	7.44		专科	102	33.01
	20001~30000元	11	3.56		本科	118	38.19
	30001元以上	5	1.62		硕士	32	10.36
住房	有	220	71.20		博士	1	0.32
产权	无	89	28.80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变量测量

现有的合作生产研究主要以理论研究和案例研究为主，在少数的定量实证研究中，研究者往往缺乏严格的量表来测量各变量，因而无法为本文提供较为成熟的测量工具。本文借鉴已有相关研究的测量思路（顾丽梅、张云翔，2019），依据质性编码结果构建问卷调查的测量工具，题项采用Likert-5点量表，量表尺度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根据已有研究（吴结兵等，2022；Vanleene et al.，2015；Uzochukwu et al.，2018），本文将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学历、收入和是否拥有住房产权等社会人口属性作为控制变量。随后，本文采用Cronbach’s α系数法测量问卷信度，主要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均高于0.7，说明各个变量的测量工具拥有良好的可靠性。本文所使用的变量、测量题项及主要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见表4。

表 4 主要变量的测量题项和变量信度

变量	题项
参与型合作生产行为 Cronbach's $\alpha = 0.78$	我会主动关注政府发布的最新情况
	我会仔细阅读政府发布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政策
	我会遵守政府发布的相关事项,例如尽量减少外出活动、保持良好的卫生和健康习惯、主动做好个人的健康监测等
	与社区工作人员沟通时,我能清楚地向他/她说明需要他/她做些什么
	我能提供必要的信息,以便社区工作人员能够履行他/她的职责
	与社区工作人员沟通时,我会表现出积极配合的合作态度
	与社区工作人员沟通时,我会友好地与他/她进行交流
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 Cronbach's $\alpha = 0.811$	如果我对改善社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工作有什么好的想法,我会让社区工作人员知道
	当我得知社区招募公共卫生志愿者的消息,我会主动报名参加
	我参加过社区志愿服务工作
	我会鼓励他人积极配合社区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政策
	我会向他人宣传与政府共克时艰的积极言论
	我会向他人宣传社区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部署和相关政策
	如果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发布寻求帮助的消息,我会设法帮助他们
利益权衡型动机 Cronbach's $\alpha = 0.746$	我会自发采取行动帮助他人,如向网友提供应对压力的健康策略等
	我很清楚我做的事情可以为我带来什么实际好处
	我觉得做这些可以使我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事件中过得更好
	我害怕如果不这么做自己会被批评谴责
	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在面对公共卫生安全的威胁
	我觉得和大家共同应对会让我感到心安
	我觉得和大家共同努力,能够有效遏制公共卫生事件
互动体验型动机 Cronbach's $\alpha = 0.807$	我觉得做这些事情并不是很困难
	我很感激处于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一线的工作人员
	我不想让一线工作人员的辛劳付出白费
	我很关心他人的健康安全
	我对他人的健康安全负有责任
	我不想给社会添乱
	我想为国家做出积极贡献
价值引领型动机 Cronbach's $\alpha = 0.722$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 结果分析

1. 共同方法偏差与区分效度检验

为了降低问卷调查中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本文在问卷发放时向被调查者强调个人信息和回答的保密性,以降低被试的社会称许性干扰。随后,本文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方法对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第

一个主成分的变异解释率为 33.848%，显著低于临界值 40% 的标准，说明本文数据不存在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

为检验变量间的区分效度，利用 AMOS23.0 对所有变量测量量表的题项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如表 5 所示，五因子模型拟合效果最好（ $\chi^2/df=1.758<3$ ， $RMR=0.046<0.05$ ， $CFI=0.913>0.9$ ， $TLI=0.903>0.9$ ， $IFI=0.914>0.9$ ， $RMSEA=0.05<0.08$ ），其余的替代模型的拟合指数都不如五因子模型理想，说明本文涉及的主要变量（参与型合作生产行为、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利益权衡型动机、互动体验型动机、价值引领型动机）可以相互区分。

表 5 验证性因子分析：区分效度

模型	CMIN/DF	RMR	CFI	TLI	IFI	RMSEA
五因子	1.758	0.046	0.913	0.903	0.914	0.05
四因子	1.79	0.047	0.908	0.899	0.909	0.051
三因子	1.929	0.05	0.891	0.881	0.892	0.055
二因子	1.947	0.05	0.888	0.879	0.889	0.055
单因子	2.51	0.062	0.821	0.807	0.823	0.07

注：四因子为参与型合作生产行为和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两个变量合并，三因子为利益权衡型动机、互动体验型动机和价值引领型动机三个变量合并，二因子模型是合并三个动机变量和两个行为变量，单因子是合并所有变量。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 6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指标和变量间相关系数。结果表明，公众的利益权衡型动机与参与型合作生产行为（ $r=0.503$ ， $p<0.01$ ）、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 $r=0.491$ ， $p<0.01$ ）显著正相关。同时，公众的互动体验型动机与参与型合作生产行为（ $r=0.604$ ， $p<0.01$ ）、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 $r=0.556$ ， $p<0.01$ ）显著正相关，公众的价值引领型动机也与参与型合作生产行为（ $r=0.581$ ， $p<0.01$ ）、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 $r=0.621$ ， $p<0.01$ ）显著正相关。上述相关分析为研究假设 1 至假设 6 提供了初步支持。由于部分自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本文对模型中涉及的变量进行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结果显示，方差膨胀因子值在 1.06–2.248 之间，均未超过公认的警戒值，有理由认为回归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表 6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性别	1.45	0.498	—								
年龄	2.21	0.986	0.19**	—							
学历	2.42	0.914	0.007	-0.159**	—						
收入	2.94	1.358	0.089	0.14*	0.238**	—					
住房产权	1.29	0.454	-0.087	-0.180**	-0.001	-0.085	—				

(续上表)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参与型合作生产行为	3.835	0.624	-0.016	0.035	0.124 *	-0.114 *	-0.067	-			
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	3.74	0.646	-0.053	0.056	0.072	-0.087	-0.094	0.741 **	-		
利益权衡型动机	3.59	0.915	-0.126 *	-0.102	0.037	-0.311 **	-0.061	0.503 **	0.491 **	-	
互动体验型动机	3.8	0.715	-0.044	-0.027	0.064	-0.143 *	-0.105	0.604 **	0.556 **	0.575 **	-
价值引领型动机	3.837	0.709	-0.125 *	-0.018	0.074	-0.235 **	-0.144 *	0.581 **	0.621 **	0.603 **	0.717 **

注：***、**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0.001、0.01和0.0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3. 回归分析与假设检验

如表7所示,利益权衡型动机($\beta = 0.184$, $p < 0.001$)、互动体验型动机($\beta = 0.327$, $p < 0.001$)、价值引领型动机($\beta = 0.244$, $p < 0.001$)显著正向影响公众的参与型合作生产行为,假设H1、H3、H5得到支持。利益权衡型动机($\beta = 0.175$, $p < 0.01$)、互动体验型动机($\beta = 0.174$, $p < 0.01$)、价值引领型动机($\beta = 0.411$, $p < 0.001$)显著正向影响公众的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假设H2、H4、H6得到支持。在验证不同动机对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的交互影响时,本文先将利益权衡型动机、互动体验型动机和价值引领型动机进行去中心化处理,以减少多重共线性的影响。交互项“互动体验型动机×利益权衡型动机”($\beta = 0.280$, $p < 0.001$)、“互动体验型动机×价值引领型动机”($\beta = 0.259$, $p < 0.001$)、“利益权衡型动机×互动体验型动机”($\beta = 0.18$, $p < 0.001$)均会显著影响公众的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且交互效应为正,假设7至假设9得到支持。

表7 回归分析结果

	参与型合作生产行为				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控制变量							
性别	-0.023	0.038	-0.067	0.008	-0.01	0.003	0.025
年龄	0.079	0.077	0.089	0.080	0.098 *	0.078	0.067
学历	0.178 **	0.087	0.118 *	0.020	0.054	0.035	0.042
收入	-0.172 **	0.015	-0.13 *	0.073	0.013	0.012	0.068
住房产权	-0.069	0.032	-0.095	0.016	0.001	0.032	0.036
自变量							
利益权衡型动机	—	0.184 ***	—	0.175 **	0.287 ***	—	0.234 ***
互动体验型动机	—	0.327 ***	—	0.174 **	0.496 ***	0.313 ***	—
价值引领型动机	—	0.244 ***	—	0.411 ***	—	0.506 ***	0.568 ***

(续上表)

	参与型合作生产行为				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交互项							
互动体验型动机 × 利益权衡型动机	—	—	—	—	0.28***	—	—
互动体验型动机 × 价值引领型动机	—	—	—	—	—	0.259***	—
利益权衡型动机 × 价值引领型动机	—	—	—	—	—	—	0.180***
R ²	0.049	0.440	0.037	0.435	0.432	0.47	0.448
调整后 R ²	0.034	0.425	0.021	0.420	0.417	0.456	0.433
F 值	3.152**	29.506***	2.343*	28.918***	28.561***	33.289***	30.445***

注：所有回归系数为标准系数，***、** 和 * 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 0.001、0.01 和 0.05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以价值共创为新趋势的合作生产理论，聚焦公共卫生应急事件中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情境，采用混合研究方法，揭示了不同类型公众合作生产行为及其背后的动机机理，为透视中国情境下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激励问题开启了一扇微观窗口。基于研究结果，本文展开以下讨论。

首先，通过对案例的混合研究发现，公众在合作生产过程中不仅专注于政府期望的政策价值，采取具有参加、合规、遵从等典型特征的参与型合作生产行为，承担与价值共创紧密关联的一般合作生产任务；也愿意为实现公共价值最大化付出额外的合作生产努力，即利用个体储备的认知资源、心智资源及其他能力资源，通过多样化的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在自由裁量范围内创造更加广泛的公共价值。就学术意义而言，与过去研究中笼统地将公众合作生产行为归纳为公众与政府共同创造价值的任何活动相比，本文依据任务特征和价值结果对公众合作生产行为类型进行细分，从价值共创角度拓展了公众合作生产行为的内容结构，为后续合作生产理论的微观行为研究搭建基本的分类框架。就政策意义而言，这一发现有助于政府根据任务类型和价值期望的现实需要，明确其所要推动的合作生产行为是什么，避免在合作生产激励过程中出现“一刀切”的线性思维，保障合作生产管理达到精准有效。

其次，研究发现，利益权衡型动机、互动体验型动机和价值引领型动机是激励公众合作生产行为的重要心理机制，三种机制均会对公众合作生产行为产

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利益权衡型动机是指公众基于合作收益和制裁损失的利益权衡,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参与合作生产的动机表现,对两类行为的影响较为稳定;互动体验型动机关注公众的感恩心理、社会归属和自我(或集体)效能感等社会心理因素,强调情感、关系、共同体验等内部激励,更侧重于引导参与型合作生产行为;价值引领型动机则重视他人利益的实现程度,折射出公众对合作生产更高的价值追求,更侧重于促成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就学术意义而言,这一发现确证了已有相关研究中的动机结论在价值共创语境下的适用性。同时本文对公众合作生产动机类型的归纳,也与当前行为公共管理领域中基于自我决定理论所构建的动机图谱有一定的理论联系和重叠(张书维、李纾,2018),契合以“自主性-控制性”为轴线分布的个体动机结构,为后续合作生产动机的精细化研究提供了思路。就政策意义而言,政府可以根据特定合作生产行为背后的关键动机,有所侧重地对既有激励措施结构进行策略性设计或优化,使公众在参与过程中接收及时有效的政府回应和行为反馈。

最后,研究发现,公众在多种动机的共同影响下更有可能产生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蕴含着公众的多元价值诉求,需要公众具备复杂的合作生产动机(Alford, 2002)。量化结果进一步指出,“利益权衡型动机×互动体验型动机”“互动体验型动机×价值引领型动机”和“利益权衡型动机×价值引领型动机”均对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具有正向的激励作用,表明不同动机之间并非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存在相互促进的交互效应,影响着公众合作生产行为的尺度和水平。这一发现也表明,外在动机和内在动机之间并非总是相互挤出。正如动机协同理论所指出的那样,外部动机削弱或促进内部动机取决于外部动机的类型(Amabile, 1993)。在本文的情境中,与利益权衡型动机相关的外部奖励是公众对安全利益的切身需求,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生理本能的自我激励而非一种操控手段。因此,利益权衡型动机并没有损害公众的互动体验型动机和价值引领型动机,而是体现出外在动机和内在动机之间的叠加效应。就学术意义而言,目前公众合作生产动机研究仍侧重于考虑动机的类型学探讨,对不同动机如何共同塑造公众合作生产行为的解释力有限。有学者指出,不同动机之间交互影响的实证分析是未来合作生产领域研究的重要议题(Letki & Steen, 2021)。本文根据公众合作生产行为在价值共创语境下的全新阐释,在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的动机归因上增加了动机交互影响的实证证据,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情境下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实证研究。就政策意义而言,这一发现为培育积极的公众主体提供了重要指引。合作生产动机通常是由复杂、多元且离散的价值关切所构成的混合形态,政府等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可以通过设计更多的参与途径及创造公共价值的机会,激励公众在“非本岗位职责”范围内,结合个体需求、能力和经验整合自有资源,丰富合作生产中公共价值创造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本文探索了以价值共创为新趋势的合作生产理论的微观层面研究。在合作生产领域的前沿文献中，尽管学者们从中观理论视角提出基于价值共创的公共服务合作生产逻辑框架（Osborne, 2018），但仍鲜有探讨个体在合作生产中如何构建价值共创的微观环境（Osborne et al., 2022）。本文在沿用 Osborne 等学者对合作生产定义的基础上，尝试突破目前相关研究多在理论层面阐述的局限并延伸至具体的合作生产情境。通过混合研究的方式，本文在案例中挖掘质性和量化证据，构建了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动机与行为模型，进而解析了公众在服务中参与各类价值共创活动的微观过程。其次，本文拓展了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价值创造研究。与 Brudney 所提出的合作生产扩展模型（Co-production Amplification Model）中的观点一致，本文认为合作生产水平不只是依赖于公众消费服务的程度，也取决于公众参与服务生产的程度（Brudney, 2020）。在 Osborne 等学者（2021）的研究基础上，本文通过细化服务生产阶段中公众合作生产行为的类型与维度，厘清了不同类型的公众合作生产行为在价值创造层面的区别和联系，进而为促成更高水平的合作生产提供理论依据。

本文仍存在以下局限：一是本文仅通过一类案例情境进行实证分析，由于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动机和行为表现依赖于服务情境，扎根于公共卫生应急情境的研究结论在其他公共服务、公共项目、公共政策中应用的推广性仍有待验证。二是合作生产动机与合作生产行为的确切关系并未进行严格的因果推断，尤其是需要进行更严格的设计确认不同动机之间相互促进这一结论的稳健性，未来可以选取合适的实践场域进行实验研究或准实验研究。三是本文在数据测量上并没有借鉴成熟的测量工具，而是将质性研究的发现作为建立测量工具的基础，这可能与经典量表的标准存在偏差，产生测量误差。未来可以在本研究的基础上开发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动机与行为量表，对相关变量的精准测量做更深入的探索。在相关实证和案例研究的基础上，为构建中国情境下的合作生产理论而努力。

参考文献

- 爱德华·伯克利、梅丽莎·伯克利（2020）. 动机心理学.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 Burkley, E., & Burkley, M. (2020). *Motivation Science*. Beijing: People Post Press. (in Chinese)
- 顾丽梅、张云翔（2019）. 共同生产视角下的城市共享单车服务治理——基于上海市案例的混合方法研究. 公共管理学报, 16(1): 89–104, 173.
- Gu, L. M., & Zhang, Y. X. (2019). Sharing Bike Service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production: A Hybrid Method Study on the Case of Shanghai.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 16(1): 89–104, 173. (in Chinese)
-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0）.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http://www.gov.cn/zhengce/2020-06/07/content_5517737.htm. 2022年5月1日访问.
- The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2020). Fighting Covid-19: China in Action. The State Council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ttp://www.gov.cn/zhengce/2020-06/07/content_5517737.htm. Accessed May 1st, 2022. (in Chinese)
- 李华芳（2020）. 合供：过去、现在与未来.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9(1): 10–22.
- Li, H. F. (2020). Co-produc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Review*, 9(1): 10–22. (in Chinese)

- 谭新雨 (2019). 外部环境变迁、服务动机激励与基层公务员变革行为——基于中国 4 省基层公务员调查的混合研究. *公共行政评论*, 12(6): 63-84+199-200.
- Tan, X. Y. (2019). External Environment Change Service Motivation Activation Promotion of Street-level Public Servants Change-oriented Behavior: A Mixed Study from Street-level Public Servants in Four Provinces.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2(6): 63-84+199-200. (in Chinese)
- 王欢明 (2022). “草根”驱动的公共服务合作生产及其机制——基于 S 市 Y 街道微基建 PPP 改造的案例分析. *中国行政管理*, 4: 27-35.
- Wang, H. M. (2022). Public Service Co-production and Its Mechanisms Driven by Grassroots: A Case Study of PPP Regeneration of Micro-infrastructure in Y Sub-district in S City.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4: 27-35. (in Chinese)
- 王学军 (2020a). 公共价值视角下的公共服务合作生产: 回顾与前瞻. *南京社会科学*, 388(2): 59-66, 94.
- Wang, X. J. (2020b). Public Service Co-production under the Public Value Perspective: Review and Prospect. *Nanji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388(2): 59-66, 94. (in Chinese)
- 王学军 (2020b). 价值共创: 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新趋势.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1(1): 23-32.
- Wang, X. J. (2020b). Value Co-creation: New Trends of Public Service Co-production. *The Journal of Shangha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21(1): 23-32. (in Chinese)
- 吴结兵、钱倩严慧 (2022). 公民共同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环境治理的多层次分析. *浙江社会科学*, 5: 76-85+157-158.
- Wu, J. B., & Qian, Q. Y. H. (2022). Factors Influencing Citizens' Co-production: A Multi-level Analysis on Environmental Behavior.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5: 76-85+157-158. (in Chinese)
- 张剑、郭德俊 (2003). 内部动机与外部动机的关系. *心理科学进展*, 5: 545-550.
- Zhang, J., & Guo, D. J. (2003). A Review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Motivation.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5: 545-550. (in Chinese)
- 张书维、李纾 (2018). 行为公共管理学探新: 内容、方法与趋势. *公共行政评论*, 1: 7-36+219.
- Zhang, S. W., & Li, S. (2018). Exploring Behavior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Content, Method and Trend.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 7-36+219. (in Chinese)
- 周文霞、郭桂萍 (2006). 自我效能感: 概念、理论和应用.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 91-97.
- Zhou, W. X., & Guo, G. P. (2006). Self-efficacy: The Conception,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Journa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1: 91-97. (in Chinese)
- Alford, J. (1998). A Public Management Road Less Travelled: Clients as Co-producers of Public Services. *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57(4): 128-137.
- Alford, J. (2002). Why Do Public-Sector Clients Coproduce? Toward a Contingency Theory.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34(1): 32-56.
- Alford, J. (2009). *Engaging Public Sector Clients: From Service-delivery to Co-produc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Amabile, T. M. (1993). Motivational Synergy: Toward New Conceptualizations of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Motivation in the Workplac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 3(3): 185-201.
- Arnstein, S. R. (1969). 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35(4): 216-224.
- Asquer, A., Street, T., & Square, R. (2012, November). Co-investment in the Co-production of Public Services: Are Clients Willing to Do It. In *Workshop on "Co-production in Public Services: The State of the Art"*, Held at Corvinus University, Budapest (pp. 22-23).
- Bovaird, T. (2007). Beyond Engagement and Participation: User and Community Coproduction of Public Service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7(5): 846-860.
- Bovaird, T., Stoker, G., Jones, T., Loeffler, E., & Roncancio, M. P. (2016). Activating Collective Co-production of Public Services: Influencing Citizens to Participate in Complex Governance Mechanisms in the UK. *Revue Internationale des Sciences Administratives*, 82(1): 53-75.
- Brandsen, T., & Honingh, M. (2016). Distinguishing Different Types of Coproduction: A Conceptu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Classical Definition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6(3): 427-435.
- Brudney, J. L., England, R. E. (1983). Toward a Definition of the Coproduction Concept.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43(1): 59-65.
- Brudney, J. L. (2020). Rethinking Coproduction: Amplifying Involvement and Effectiveness. *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 5(1): 8-27.
- Carmeli, A., McKay, A. S., & Kaufman, J. C. (2014).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Creativity: The Mediating Role of Generosity and Vigor. *The 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 48(4): 290-309.
- Eisenberger, R., & Cameron, J. (1996). Detrimental Effects of Reward: Reality or Myth? *American Psychologist*, 51(11): 1153.
- Fledderus, J., Honingh, M. (2016). Why People Co-produce within Activation Services: The Necessity of Motivation and Trust: An Investigation of Selection Biases in a Municipal Activation Programme in the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82(1): 69–87.
- Hoeber, I. J., Van Knippenberg, D., Van Ginkel, W. P., & Barkema, H. G. (2012). Fostering Team Creativity: Perspective Taking as Key to Unlocking Diversity's Potential.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7(5): 982–996.
- Jakobsen, Morten. (2013). Can Government Initiatives Increase Citizen Coproduction? Results of a Randomized Field Experiment.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3(1): 27–54.
- Letki, N., Steen, T. (2021). Social-psychological Context Moderates Incentives to Co-produce: Evidence from a Large-scale Survey Experiment on Park Upkeep in an Urban Sett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81(5): 935–950.
- McCullough, M. E., Kilpatrick, S. D., Emmons, R. A., & Larson, D. B. (2001). Is Gratitude a Moral Affec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7(2): 249–266.
- Osborne, S. P. (2018). From Public Service-dominant Logic to Public Service Logic: Are Public Service Organizations Capable of Co-production and ValueCo-creation?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20(2): 225–231.
- Osborne, S. P., Nasi, G., & Powell, M. (2021). Beyond Co-production: Value Creation and Public Services. *Public Administration*, 99(4): 641–657.
- Osborne, S., Powell, M. G. H., Cui, T., & Strokosch, K. (2022). Value Creation in the Public Service Ecosystem: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82(4): 634–645.
- Osborne, S. P., Radnor, Z., Kinder, T., & Vidal, I. (2015). The Service Framework: A Public Service-dominant Approach to Sustainable Public Services. *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 26(3): 424–438.
- Osborne, S. P., Radnor, Z., & Strokosch, K. (2016). Co-production and the Co-creation of Value in Public Services: A Suitable Case for Treatment?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18(5): 639–653.
- Ostrom, E., Parks, R. B., Whitaker, G. P., & Percy, S. L. (1978). The Public Service Production Process: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Police Services. *Policy Studies Journal*, 7: 381.
- Parks, R. B., Baker, P. C., Kiser, L., Oakerson, R., Ostrom, E., Ostrom, V., ... & Wilson, R. (1981). Consumers as Coproducers of Public Services: Some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Considerations. *Policy Studies Journal*, 9(7): 1001–1011.
- Parrado, S., Van Ryzin, G. G., Bovaird, T., & Löffler, E. (2013). Correlates of Co-production: Evidence from a Five-nation Survey of Citizens. *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Journal*, 16(1): 85–112.
- Pestoff, V. (2012). Co-production and Third Sector Social Services in Europe: Some Concepts and Evidence.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23: 1102–1118.
- Sharp, & Elaine, B. (1978). Citizen Organizations in Policing Issues and Crime Prevention: Incentives for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Voluntary Action Research*, 7(1–2): 45–58.
- Skälén, P., Karlsson, J., Engen, M., & Magnusson, P. R. (2018). Understanding Public Service Innovation as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Creation of Value Propositions. *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77(4): 700–714.
- Steen, T. (2006). Public Sector Motivation: Is There Something to Learn from the Study of Volunteerism?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21(1): 49–62.
- Steen, T. (2021). Citizens' Motivations for Co-production: Willingness, Ability and Opportunity at Play. In Loeffler, E. & Bovaird, T.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Co-production of Public Services and Outcomes* (pp. 507–525).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Tuan, L. T. (2018). Behind the Influence of Job Crafting on Citizen Value Co-creation with the Public Organization: Joint Effects of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and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20(10): 1533–1561.
- Uzochukwu, K., & Thomas, J. C. (2018). Who Engages in the Coproduction of Local Public Services and Why? The Case of Atlanta, Georgia.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8(4): 514–526.
- VanEijk, C. J., & Steen, T. P. (2016). Why Engage in Co-production of Public Services? Mixing 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82(1): 28–46.
- Vanleene, D., Verschuere, B., & Voets, J. (2015). Co-producing a Nicer Neighbourhood: Why Do People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jects? In *IIAS Workshop on Coproduction*.
- Verschuere, B., Brandsen, T., & Pestoff, V. (2012). Co-production: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Research and the Future Agenda.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23(4): 1083–1101.
- Woods, P., Gapp, R., & King, M. A. (2016). Generating 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 Methods to Understand Health and Illne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Pharmacy*, 38(3): 663–670.

责任编辑：张书维